

中国转型中的 制度结构与变迁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CHINESE
TRANSITION

张曙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

张曙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沙超英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

张曙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三河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14.5 印张 380000 字

2005 年 4 月第一版 200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 - 4000 册

ISBN 7-5058-4524-1/F·3796 定价：25.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选集自序

这本自选集收录了笔者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19 篇学术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笔者的学术实践和生存环境。

笔者 1959 年进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学习，1963 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杨坚白、刘国光、董辅初教授，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1966 年研究生毕业，留在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研究室，即现在的宏观经济研究室做研究工作。接着是“文革”的十年浩劫，直到 1977 年才恢复业务，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

专业名称的不同反映了理论范式的差别。笔者接受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再加上原来学科分工过细过窄的限制，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经历了一

个巨大而深刻的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笔者的学术生涯也经历了一个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个虽不能说是痛苦但也不那么轻松的过程。经过不断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探索新的未知领域，才有了一点进步和收获。笔者的学习方法主要有二：一是认真读书，特别是对基本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要真正做到熟练掌握和融会贯通；二是向现代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年轻同仁学习，与他们经常讨论和交流。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上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本书收入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的学术实践及著述出版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分析。这是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上半期主要是围绕着《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上海三联书店，1990）的研究写作和进一步的讨论进行的，本书收入的“两种不同机制下的经济调整”、“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和“地区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竞争”，就是部分研究成果。下半期笔者主持了社科基金的两个课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并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研究力量整合起来，进行比较系统的宏观经济分析。由于这些研究做得比较认真，且有自己的特色，受到学界、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好评，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到目前为止，这方面形成多项研究成果，已经出版的有：《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1、第2、第3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001、2002年版）、《市场化与宏观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政策和体制联动——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宏观经济分

析报告》(第4集)即将出版。

二是经济学学术书评。鉴于经济学书评的广告化和学风的浮躁,笔者花了很大力量,专注于经济学书评的写作,对国内有代表性的比较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和一些热销书进行了评论,特别是对一些学术观点的进一步讨论和对一些不正之风的批评,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这些评论已经汇集成《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及其增订版《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

三是经济评论和随笔。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一事一议的方法,撰写了大量经济评论和随笔。这些评论大都是深入浅出,借题发挥,阐明一个经济学道理,给人以启迪和思考。现已出版了随笔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及其修订版《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此后,这类文字还有百多篇,结集在《思想自由与经济自由》一书中,即将出版。

四是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这是笔者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作为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小结,1999年出版了《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这一研究既反映了笔者知识结构的更新过程,也与所处承前启后的地位有关。收入本书的“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和“经济制度的三角结构和三角替代”,后来改写成前书的两章。作为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笔者主持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相应课题研究,编辑出版了《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1、第2、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2002年版),第4、第5集正在研究之中。其中,笔者撰写的两个案例:

“放开粮价，取消粮票——中国粮食购销制度变迁案例研究”和“政府、农民和市场——山东惠民‘大市场’要灭‘小’市场和浙江义乌小市场变成大市场案例的比较和分析”，也收入在本书之中。

收入本书的19篇论文，就是笔者在这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上的成果。所收文章均散见于各种出版物，其中，“地区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竞争”、“市场分割、资本深化和教育深化”等五篇文章尚未发表。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虽然有些思想已经融入了上面的著述，但作为这些思想的最初阐述，仍有其独立的意义，更何况很多研究并未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反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理论探讨：如“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非市场化的经济谈判”、“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等；一类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分析：如“地区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竞争”、“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理论思考”、“决策权的配置与决策方式的变迁”等。这些文章注重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结合，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践出发，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解析中国的经济现实，突出了理论思想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在理论分析和制度分析上超越了以往热点话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坚持了运行分析与体制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统一，着重于探寻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行为过程以及宏观经济变动的微观基础。因而，本书所论不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指向，而且有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

从研究方法来看，除了一般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实证文章以外，有四篇经验实证的文章，它们是：“关于地区经济差异变动的另一种解释”；“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放开粮价，取消粮票”；“政府、农民和市场”。这四篇文章分为两类，前两篇属于一

般的经验检验文章，后两篇是案例分析文章。这些文章都有比较广泛的影响，虽然不能说是做得很好，但是自信做得比较认真，避免了某些缺乏理论前提和理论假定，为实证而实证的倾向，同时进行了理论发现型案例分析的探索。在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方面也是有意义的。

笔者学术观点的基本倾向是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确立和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限制和约束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力；崇尚事物的自然生发和自然演化，疏于人为的制度设计和秩序建构；喜好妥协、合作、宽容、互惠的行为方式，又能坚持原则，观点鲜明地提出和说明问题；热衷于学术自由，人格独立，又为开展学术批评、建立学术规范、净化学术空气、建立良好的学风而竭尽全力。从本书收入的文章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本书中有部分篇章是合作成果，感谢合作者允许笔者将文章收入本书之中，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沙超英女士。

最后，我想把本书献给学界的同仁，我的先辈、同辈和晚辈，衷心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怀、指点和帮助。

2005年1月20日
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目

录

自选集自序	/ 1
两种不同机制下的经济调整	
——兼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	/ 1
论个人收入的实物化	/ 17
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	/ 28
非市场化的经济谈判	
——一种现实的交易方式和运行机制	/ 41
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	
——兼评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	/ 64
关于地区经济差异变动的另一种解释	/ 80
地区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竞争	/ 92
经济制度的三角结构和三角替代	/ 132
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分析	/ 144
放开粮价, 取消粮票	
——中国粮食购销制度变迁案例研究	/ 161
重建国有产权和向市场经济转型	/ 193
体制转轨的新阶段与宏观运行的新态势	/ 205

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理论思考 / 228

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 / 245

政府、农民和市场

——山东惠民“大市场”要灭“小”市场与浙江义乌小

市场变成大市场案例的比较和分析 / 272

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

市场、政府和道德 / 298

迈向公正规则下的竞争性经济：加入 WTO

及其应对方略 / 315

决策权的配置与决策方式的变迁

——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系统思考 / 349

市场分割、资本深化与教育深化

——关于就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 403

附录 / 442

两种不同机制下的经济调整*

——兼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

建国以来的三次重大经济调整，是在计划者主权机制和多元主权机制这两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下进行的。虽然三次经济调整具有其一般性质和共同内容，但在不同机制下的经济调整，其行为特征和后果又是不完全相同的。从经济调整的机制条件来看，能够有效地进行经济调整的经济运行机制是计划者主权机制而非多元主权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难以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一、两种机制和三次调整

本文讨论的经济调整不是指经济运行中经常进行的各种“微调”，而是特指经济的重大调整，其基本标志是经济运动进程突然发生重大改变。“微调”是经常进行的，目的在于保持经济运行的

* 本文系与樊纲合作。

常态,而经济调整是间断进行的,表现为运行常态的中止或者偏离,也就是说,经济调整是经济运行的非常时期。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的运行中曾经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经济调整,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第二次是8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第三次是1988年以来正在进行的以治理整顿为中心的经济调整。要对当前的治理整顿及其与改革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不仅需要对几次经济调整本身做一些比较分析,而且需要将其放在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和体制背景下来考察。

自从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体制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①。在改革前,我国经济中虽然也存在多个经济主体:计划者^②、政府、地方、企业和个人,真正有权引导经济运行和直接参加经济变量决定的只有计划者,或者说只有“国家”(=计划者+政府),其他主体均不能直接参与经济变量的决定和引导经济的运行。因此,根据经济运行机制的“主权规定”和“主权特征”,我们把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运行体制称为计划者主权机制。在现实中则表现为国家主权机制。以放权让利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改革,一方面使地方、企业和个人有了一定的经济权力,能够直接参与经济运行的引导和经济变量的决定,另一方面,计划仍然保留着一定的经济权力,在经济运行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和起着重要作用,于是形成了一种包括计划者主权在内的多元主权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经济变量的取值并不是由计划者或者国家单独决定的,而是由计划者(或者国家)、基层单位(包括地方和企业)和个人共同决定的。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经济运行的常态时期,也反映在经济运行的非常时期,即反映在经济调整中。

① 关于公有制两种运行机制的详细分析,见樊纲、张曙光、杨仲伟:“公有制经济的两种运行机制”,载于《经济研究》1990年第5期。

② 计划者是一个理论概念,代表公有权主体,是公有制经济的国家职能的一个方面,它与政府一起共同构成国家。其具体界定参见《经济研究》1990年第5期。

把我国的三次经济调整放在上述的体制背景下来考察，可以看到，三次经济调整是在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机制下进行的。第一次经济调整是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进行的，第三次经济调整是在多元主权机制下进行的，第二次经济调整发生在两种运行机制交替之时。从时间来看，发生在改革起步阶段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计划者主权机制，多元主权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或者刚刚开始形成。因此，如果从实质上进行分类，那么，70 年代末的洋跃进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调整，仍然可以归之于计划者主权机制下的经济调整。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不同经济运行机制下的两类不同的经济调整。

二、经济调整的一般性质和共同内容

（一）经济调整的一般性质

要说明经济调整过程，首先需要说明经济的运行常态。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运行呈现出一种过热常态，其主要标志是短缺和过度增长，1958 年的“大跃进”、1978 年的“洋跃进”，80 年代的高增长等都是这种过热常态的极端表现。为什么我国经济会出现过热常态？它是我国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表现和必然结果。

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计划者、政府、地方、企业和个人等各个行为主体，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执行不同的经济职能，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利益追求，这些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利益追求必然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计划者作为公有权的主体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仅负有依据全民利益对经济运行进行计划调节的

责任，而且必须取得财产收入，承担着进行积累和投资的职能。

个人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其一切收入都表现为劳动收入，他只有就业的权利和消费的职能，而无积累和投资的责任，其行为目标是个人收入和效用的最大化，因此，一切个人消费的增长都表现为劳动收益率提高的结果，而与资本积累无关。个人的这种地位就使得它不可避免地把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看做是劳动的生产力，把资本提供的新增生产力，当成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把由此而导致的收入增长和消费提高，都错误地当做劳动本身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于是产生“收入幻觉”。这使得个人具有高消费意向和低积累意向。因此，即使假定计划者的积累意向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其与个人的积累意向也必然会发生矛盾。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虽然这种矛盾的实际作用很小，但依然存在。在多元主权机制之下，由于企业取得了产品自销权和定价权以及收入分配自主权，个人也就具备了将其高消费意向变为现实的条件，即个人也就拥有了引导经济运行的实际主权，就会在经济变量的决定中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

地方和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基层单位，其行为目标是各自收入的最大化，它们是公有财产的经营者和使用者，而不是所有者，其一切收入都是经营收入，都表现为经营有方的结果，而非财产收入，这就使得各单位的资源使用量使用比例没有所有权的界限，在收益与资源使用量相关的情况下，各基层必然利用其作为公有制经济一个组成部分的“血缘关系”和“各自收入源泉的不确定”，进行“兄弟竞争”和资源争夺，以扩大自己的收入源泉。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这种争夺是通过计划会议内外的投资争议进行的。在多元主权机制下，基层有了投资自主权，除了投资争议以外，就会通过货币发放开展直接的投资竞争。

政府作为进行社会管理的行政机构，由各种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组成，出于政治任期等方面的考虑，其行为目标是政府偏好，包括管理方便、任期长久、社会安定等，这一切也会与计划者的偏好发生矛盾，对计划者的决策形成干扰，使之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

轨道。特别是政府的高增长意向更形成投资膨胀的重要原因，再加上计划本身的局限性，积累和消费、成本与收益、劳动与闲暇之间的内在矛盾就变成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外在对立，无法形成自由选择的界限和自我约束的机制。

这些矛盾斗争的结果是：一方面必然造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膨胀，另一方面必然造成资源生产效率、配置效率的降低和动态无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总供给的规模多大，总需求总是大于总供给；不管总供给怎样增长，总需求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于是短缺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短缺形成供给增加的巨大压力，为了消除短缺，必然过度使用现有生产能力，形成经济的过度增长。从静态来看，过度增长可以使一部分缺口暂时得以弥补，但从动态来看，过度增长造成的动态无效率，会使短缺进一步加剧。因此，过度增长不仅不能消除短缺，反而会使短缺加剧。于是形成短缺推动短缺、过度增长引起过度增长，短缺的“再生产”伴随着过度增长的“再生产”，过度增长也就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我们把短缺和过度增长的有机统一，称做经济运行的过热常态。

然而，过热增长也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它迟早会达到某种经济和社会的极限。由计划者出面发起并组织实施的经济调整，就成为强制性的中止经济运行常态，即中止短缺下过度增长的非常态过程。经济调整的这种一般性质，无论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和 80 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还是在目前的治理整顿中，都是一样的和共同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调整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发生和在怎样的时期发生，取决于人们对经济过热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认识、判断和权衡。当过热增长能够为社会带来净效益时，人们不会停止它和改变它；只有当过热增长为社会带来净损失时，人们才会想到中止它和改变它。如果以 $W(y^*)$ 表示适度增长的社会经济效益，以 $W(y - y^*)$ 表示过热增长的正效益，以 $C(\dots, t)$ 代表过热增长的负效益，以 ΔW 表示过热增长的净效益，我们就可以对经济调整的时期做如下描述（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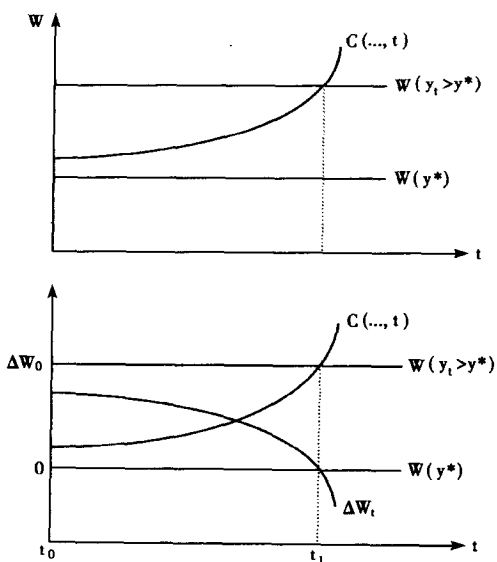


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 经济高速增长一般不会发生在过热增长的初期, 这时过热增长的正效益大于负效益, 净效益为正值。随着过热增长达到 t_1 , 正负效益相等, 净效益为 0, 人们才会感到有调整的 necessity, 但实际调整过程一般不会发生。因为此时, 过热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效率损失, 即高速增长之后不得不进行调整时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和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社会生产力损失, 只有在未来时期才能显现出来, 高速增长本身造成的“繁荣假象”, 还不会使人们采取刹车的调整措施。真正进行调整是在 t_1 以后的某个时候。

(二) 经济调整的共同内容

经济调整是针对短缺下的过热增长进行的, 目的是要消除短缺和过热增长及其所产生的负效应; 由于短缺和过热增长的社会经济负效应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 因此, 经济调整的基本内容和方式也

大同小异。不论是 60 年代初和 80 年代初的经济调整，还是目前的治理整顿，其基本内容都要消除过热增长造成的不良后果。

首先，由于短缺下的过热增长过程总是以总需求膨胀为起点和推动的，短缺所引起的被迫储蓄、通货膨胀和灰市交易所造成的社会不满，不仅意味着社会福利的降低，而且对经济的运行产生进一步的不良后果。因此，要停止这一过程，首先必须压缩总需求，包括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其次，由于过热增长造成现有资本的过度使用、过度损耗和补偿不足以及资本净增长率下降趋势，经济调整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当总需求压缩以后，短缺压力小了，社会和企业也就有时间和精力对过度损耗的资本进行补偿和更新，恢复和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

再次，在过热增长中，短缺压力最大，资本过度使用最严重的是基础部门，因而造成基础瓶颈，使基本经济结构恶化。社会资本补偿过程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常常是结合进行的，构成经济调整的重要内容。结构调整有两种方式和两个方面：一是采取流量调整方式，实行投资倾斜政策，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处于短缺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二是采取存量调整方式，对长线工业和低效率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使现有生产能力得以重新配置。

（三）经济调整的代价和后果

由于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把过度膨胀的总需求压下来的前提下，恢复被过度消耗的一部分社会生产能力，并通过抑长补短的办法进行结构调整。这一过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1960 年、1961 年、1962 年是如此，1980 年、1981 年也是如此，1989 年也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把短缺引起的过高增长速度压了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调整过程必须花费一定的社会成本。这是过热增长的高额社会成本的一部分，主要包括：（1）重新配置、改装生产设备的费用；（2）转产改造过程中的设备闲置；（3）资源的绝对损失，